

# 为“科学小说”探源

—以《海底旅行》为中心

闫东方\*

- 一、绪言
- 二、翻译策略
- 三、科学与小说的变奏
- 四、结语

## 〈국문초록〉

프랑스 작가 쥘 베른의 소설 《해저여행 2만리》를 중국어로 번역한 中譯本 《海底旅行》은 노적동(盧藉東)과 홍계성(紅溪生)이 공동으로 번역하여 잡지 《신소설 新小說》에 처음으로 연재되었다. 본 논문은 먼저 《新小說》의 창간과정에 대한 분석을 통해 《海底旅行》이 연재되었던 당시의 시대 상황을 고찰해 보았다. 두 번째, 中譯本의 번역책략을 분석하여, 清末 “의역경향(意译风尚)”이 문장의 첨삭에 미친 영향과 章回小說 文體와 여행기 서술방식의 문체를 사용함에 따라 발생한 서술 방식의 변화 등에 대해 논의해 보았다. 세 번째, 텍스트의 선택, 註釋에 나오는 역자의 번역관과 소설 내용의 세 가지 측면에서 “科學救國”思想의 功利的 目的과 文學의 本位觀念이 소설작품에서 어떻게 표현되는지를 고찰해 보았다. 끝으로 《海底旅行》을 번역 문체와 소설유형 등의 측면에서 原作과 中譯本이 가지고 있는 意味와 限界에 대해 탐구해 보았다.

---

\* 中國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課程研究生

핵심어 : 《海底旅行》, “科学小说”, 문예잡지 《新小说》, 梁启超, 질 베른

## 一、绪言

《海底旅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 的小说《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即《海底两万里》) 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也是第一个被分类为“科学小说”的作品。它由卢籍东意译, 红溪生润文, 部分回目标明披发生批注, 从《新小说》创刊之时就在“科学小说”栏目连载, 也是该栏目刊载过的唯一小说, 第二十一回后再无更新, 以残局收场。一般来说, 《海底旅行》被定位为晚清较早译介的凡尔纳小说, 并因当下语境中“科幻小说”对“科学小说”具有可替代性, 所以这一被明确放置于“科学小说”栏目的译作也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起源时期的作品。<sup>1)</sup> 不过, 正如黄祿善从“science fiction”的翻译历史以及西方“hard science fiction”和“soft science fiction”的分类对“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的概念所作出的辨析, 虽然“科学小说”“建立在幻想基础之上, 但是这种幻想并非任意妄为, 而是隐隐约约遵循一定的科学事实或科学逻辑”, 与不受科学逻辑束缚的“科幻小说”存在一定

---

1) 如陈翔灵以《海底旅行》为例探析清末科技新词汉译的文章中, 用科幻小说指称《海底旅行》, 而不采用“科学小说”的说法, 见陈翔灵:《清末科技新词的汉译探析——以翻译小说《海底旅行》为例》,《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12-117。再比如袁丽梅对近代西方科学小说进行研究的文章中, 则将“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理想小说”通称为“科幻小说”, 见袁丽梅:《消闲读物, 启蒙利器——近代西方科学小说译介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11期, 66。贾立元的《“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对“科学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试图对不同概念的转换, 及其中张力作出辨析, 第一部分也含有“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混合使用的说明, 见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62-77。

差别。<sup>2)</sup> 本文亦采用“科学小说”作为《海底旅行》的分类，借以标明译者、出版者在第一次译介《海底旅行》之时对一种新的类型文学的特殊看法，及其独特的文学、政治意义。

要理解《海底旅行》的译介，首先要将其放置在《新小说》的办刊语境中。《新小说》创刊于1902年10月，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东渡日本在横滨创办的文学刊物，主办者为梁启超，编辑发行者为赵毓林，印刷者为岸太郎（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发行所为新小说社（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印刷所为新民丛报社活版部，从第十三号开始，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刊物虽名月刊，但时有脱刊，一共出版二十四号。《新小说》创刊号“论说”栏目刊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直被学界视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词，从《新小说》杂志内部看这篇文章，它不仅被安排在创刊号之首，而且无个人署名，说明文章应为办刊同人的共同意见，含有发刊词意味。从刊名“新小说”的角度来理解这篇文章，虽然文中并未明确提出“新小说”之“新”在何处，但是却在末尾以相当篇幅说明小说于国民性格的负面影响，所谓“新小说”，要求能够革除当下小说之弊病，使国民性体康健，有益于国富民强，暗含着思想内容上的“新标准”，杂志刊载的作品，则起到一定的范本作用。《海底旅行》以“科学”为新思想内容，期望以此救国救民，是“新小说”的一个典型例子。

从刊物的栏目分类上来看，《新小说》分为“论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广东戏本”“杂技”“杂歌谣”等15个栏目，遵循题材和体裁双重分类原则，戏本、小说等分类即以体裁为原则，“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分类则以题材为原则。这是首次以“科学”为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也是“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出现。中国本无“科学”一词，鸦片战

---

2) 黄祿善：〈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4期，42-44。

争之后, 虽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已成共识, 但是始终将其归于格致之学, 承载的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器物观。康有为于1897年编辑《日本书目志》最早从日文引入“科学”一词, 后梁启超、蔡元培、严复等人较早使用该词, 其外延“有时专指自然科学, 有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维新思想家比较普遍地认定自然科学具有更本源的意义, 即认为自然科学是更标准的科学。”<sup>3)</sup>《新小说》以《海底旅行》为“科学小说”, 一方面, 可能沿用了日译本在日本的分类, 另一方面, 以文学手法引介科学观念以及分科知识, 是梁启超等人所持的科学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这也就突出了“科学小说”区别于“科幻小说”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新小说》还是清末较早使用“科学”一词的现代报刊,《新小说》以“科学”为小说分类的做法开启了报刊杂志对于科学观念和分科知识的引介, 继《新小说》“科学小说”栏目之后, 不仅有专门的《科学世界》杂志介绍生物、工程等分科知识, 其他杂志如《女子世界》《东方杂志》也开辟分科知识或科学观念普及的专栏, 是较早一批进行科普实践的报刊杂志。民国后, 关于分科知识以及科学观念的引介在报刊杂志中全面铺展, “科学”一词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口号之一, 形成一股思潮。

此外,《新小说》以“科学小说”定位《海底旅行》,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凡尔纳小说在中国的解读。陈向红〈凡尔纳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中认为, 凡尔纳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对应着不同的作家身份定位: 晚清到“五四”前后, 凡尔纳多为启蒙者形象; 建国到1980年代末为经典科幻作家形象; 1990年代后科幻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严肃作家多元并存。<sup>4)</sup> 不难发现的是, 对凡尔纳的定位除去严肃作家之

3) 邱若宏:《传播与启蒙 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6。

4) 陈向红:〈凡尔纳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外，都与小说中包含大量的科学内容有关，而这恰是《新小说》“科学小说”栏目着意所在。把“科学”和“小说”视为进入《海底旅行》的两个通道，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科学”一词的引进和晚清小说变革两条线索对“科学小说”的政治功能和文学性进行考察。

## 二、翻译策略

《新小说》以“科学小说”为小说分类之时，“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以《海底旅行》的翻译不仅意味着文学范畴内新文本的译介和接受，还包含着不同于传统器物观的科学观念和异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分科知识的传播问题。并且，对于《海底旅行》来说，正是后者构成了“新小说”之所谓“新”的内容，那么，如何将这些内容转化到小说中，并适应我国国民的智识水平和文学趣味，就成为翻译的重点难点。作为一本翻译小说，《海底旅行》并未交代所参底本。日本学者中村忠行最早提出，《海底旅行》并非由凡尔纳所著的法文小说直接翻译而来，所参底本应该为日本大平三次的译本，即明治十七年(1884)大平三次译，服部诚一校阅，四通社出版的《五大洲中海底旅行》。<sup>5)</sup>而大平三次译本的底本又为英文译作，所以，《海底旅行》经历了法—英—日—汉三道翻译程序。在《新小说》所刊行的《海底旅行》中，第

---

年第3期，160-166。

5) 我国学者范苓通过译本对比对此持肯定意见，同时提出原著作者和国籍的译法更接近井上勤《六万里 海底纪行》所译的“英国ジュールスベル子氏原著”，而非大平三次版“佛国ジュールスベルン原著”，参见范苓：〈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119-123。

一至四回署名英国萧鲁士原著，南海卢籍东译意(也即意译)，东越红溪生润笔；第五回以后，由红溪生述；第五至九回标明披发生批注；第十六至十九回有批注，无署名。不难看出，在《海底旅行》的翻译中，不仅是所参底本并非原著，而且译者亦自觉认识到其翻译策略不同于直译，为“译意”和“述”。这一策略在转化“新内容”的时候是如何实施的，实践结果如何是本节所要关注的问题。

### (一) 意译风尚

在《海底旅行》中，意译首先体现在对人物名字的处理，为了方便读者记忆，译者将主要人物姓名以中文“姓+名”的方式命名为欧露世、李梦、李兰操、高昔鲁等。

其次，针对专业性的分科知识，进行意译、简化、删削处理。陈翔灵对《海底旅行》科技新词的词法构成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纳为三种规范：①以不同词语描述同一概念，如潜水艇的翻译有“水底潜行船”“水底潜行铁舰”“水底铁舰”“通航海底的轮船”等；②使用偏正结构，如“电气”修饰灯，“下水的”修饰衣服，对名词实物进行材料、用途、性状等方面的描述，以期达到意译而非音译的效果；③遵循清末科技词汇系统，如“船”“舰”等词语的运用。同时她注意到所参底本对译著的影响，认为在清末“枪”已经代替了“铳”，译文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电铳”极有可能是借用了日译本中的翻译。<sup>6)</sup>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的话，能看到《海底旅行》中与船舰相关的科学内容翻译较为充分，而大量的生物学、大气学等知识则相对较弱，如参观潜水艇一节中，红溪生不仅压缩了贝类介绍，并且以颜色、形状之差别代替贝类的专业分类：

6) 陈翔灵：〈清末科技新词的汉译探析——以翻译小说《海底旅行》为例〉，112-117。

“起身看那房内的珠宝，只见一幅像架旁有几个头号玻璃瓶，装满着许多珊瑚、玛瑙、珠贝之类。各瓶种类不同，各瓶放出各种的异彩，也有青的，也有红的，也有黄的，也有白的，也有光怪陆离，精莹四射，只是眼睛好看，名儿是不知道的。又是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方的、圆的、三角的、扁的。”<sup>7)</sup>

这段翻译可以与1961年由曾觉之翻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海底两万里》相较。在曾的译本中，前文不仅出现了大量不同专业的西方名人，并且以注释的形式标明人物生卒时间以及身份，对贝类的翻译更是极尽所能，详细介绍王槌贝、棘皮王贝等贝壳的产地、形状、颜色，还在该段的末尾详细列出了“纽丝螺、燕子螺……棱形贝”，并且称赞“这些精美脆酥的耗贝，科学把最美丽的名词作为它们的名字。”<sup>8)</sup>

此外，意译还表现为对内容的随意增补，第五回中，欧露世、李兰操等人被困内支士舰，以欧露世心理活动表现对国人的看法：“那管你国破家亡，牛马奴隶，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忠君，什么叫做爱国，只会摇尾求食，甚且将身作鬼……更有那起平日说忠说孝，讲究气节，满肚嗜欲，貌为高古，自己一点儿能耐没有，到饿起来的时候，却把从前自己所讲的丝毫也不能记……”<sup>9)</sup>这一段与旅行主题相去甚远，读之颇多疑问，披发生在页眉处的批注是对这一情况的解释：“我佑量著原书未必有这许多话，检来一查，果然没有，却是红溪生造出来，但这一棒一喝都是有关世道之，又红溪生苦心，读者请服膺，幸勿辜负。”<sup>10)</sup>

披发生从世道、苦心解释的红溪生增补部分，正是《新小说》办刊目的所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称，“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

7)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104。

8) 凡尔纳著，曾觉之译：《海底两万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96。

9)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83。

10)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83。

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sup>11)</sup> 国家危亡的现状导致译者一方面删减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功利的枝节, 另一方面却又大量增补服务于功利目的的劝言, 也就使得《海底旅行》中有关“科学”的表达依然具有器物观的局限。不过, 在《新小说》创刊的同年, 梁启超已有将“科学”上升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的精神”<sup>12)</sup> 的认识, 而邱若宏更是认为, 在维新派这里, 科学观念开始突破“器物”观, “初步实现由‘技’到‘道’的提升与泛化, 是后来盛行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滥觞。”<sup>13)</sup> 那么, 为何译著为 人物注入的是“忠孝”“节气”之精神, 而非“科学的精神”? 这或许也可以从小说变革过程中人物塑形难度来考虑, 《海底旅行》中把人物作为救亡观念的载体, 不仅决定了人物塑造存在概念化的倾向, 而且“说忠说孝, 讲究气节”的老中国儿女要转变为“善怀疑, 善寻问”新国民, 又涉及新形象的创造问题, 所以, 尽管意译是一种较为自由的翻译策略, 也有其力所不逮之处。

除去《海底旅行》外, 在《新小说》第一号中还有三篇翻译作品, 占到了刊载小说数量的三分之二, 《世界末日记》标明饮冰译, 《二勇少年》标明南野浣白子述译, 《离魂病》标明披发生译述, 不论是“译意”“润文”或者“译述”“述译”“述”都表明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著, 是一种含有再创作之意的转化行为, 也可表明意译为主的翻译策略是译者的主动选择。从外部原因来说, 正如陈平原为晚清译文的意译风尚所做解释, 《海

1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

12) 他认为,“科学精神”在于四点:“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臚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87。

13) 邱若宏:《传播与启蒙 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66。



底旅行》的翻译事实上也受到作者翻译水平和晚清“口授、笔录两者分工合作的对译制度”的影响。<sup>14)</sup> 而从《新小说》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来说，意译也是一种更为适宜的翻译策略。

## (二) 章回体小说

《海底旅行》有着明显的章回体形式，首先体现在小说以“回”分节，回目整齐，为七字或者八字的对偶句式，如第一回“怪妖肆虐苦行舟 勇士披奇泛沧海”，<sup>15)</sup> 第六回“主宾情重同慰天涯 海国界宽初惊福地”，<sup>16)</sup> 并以诗句在每一章末尾做出感叹，如第四回末尾以“自分天涯久漂泊，居然海底作樊笼”作结；<sup>17)</sup> 其次，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均不能脱离“话说……”和“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叙述套语；第三，尽管译述者很巧妙地将自己藏身于欧露世视角背后，但是在文本中亦出现几处不能遏制的现身冲动，尤其是在第十六回回首：

“话说内支士船由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新小说》报第六号说他仍然沉入海底，直到今年六月十五日已经是对年了，一点音信没有，难道他们这一伙人都淹死了不成？讲到这里，说书的人虽是人老脸老，也有些对不住，未免在几层厚皮子里头，勉强透出几滴鲜血来，红给看官们看看。一来表这内支士船并无别故，往后好玩的事体多着呢；一来使看官们晓得说书的人并不是天良丧尽，于万分之中，也还捞得出一两分的，话虽恁地说，这也不全是说书人有心耽误看官们的清兴。看官那里知道，说书人生来命苦，容易不得常住一

14)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625-626。

15) 萧鲁士著/卢籍东译意/红溪生润文：《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1期，77。

16)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89。

17) 萧鲁士著，卢籍东译意，红溪生润文：《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1期，100。

个地方，优游岁月。自从上回销缴过笔墨债，已经又跑了许多地方，鬼混了许多事体。虽不是旅行海底，这个尘尘人世也就与海差不多了，因此每日竟腾不出片刻新鲜时候来，把他们海底的消息料理料理。看官难道是说书人心甘情愿吗？叫做出于无奈罢了。于今又鬼混到一个好所在，便又要敲着鼓板拍着大腿在看官们面前絮聒絮聒了。”<sup>18)</sup>

这一大段入话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海底旅行》连载于《新小说》，而《新小说》又时有脱刊，加之述者在文本中解释的原因，使得第十六回连载的时候，距第十五回刊载已经一年有余，译述者作此长段，在说明原因的时候，更加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其本意即是以章回体作为连载译作的体裁。另，此段页眉处，有“此一大段是学儿女英雄传的，自己辩护处，却也说得委婉”做评注，更显示出译作与中国传统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sup>19)</sup>

那么，章回体小说与译作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为何新小说的译介并未带来体裁上的变革？事实上，《海底旅行》所参照的《五大洲中海底旅行》即为章回体小说。在范苓的文章中提及“虽然大平所依据的英译底本不详难以对照，但从每一章节前增设的双句对偶回目，到第一回开篇‘话说’的起句，可见在翻译形式的选择上，大平译本仍未彻底摆脱传统的章回小说的影子。”<sup>20)</sup>有独无偶，简千芮认为，“从日译本的书写语言来看，《地底旅行：拍案惊奇》的翻译受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影响，在每章每回中加入对偶回目”，而《地底旅行：拍案惊奇》正是鲁迅翻译《地底旅行》所参照的底本。<sup>21)</sup>

18) 红溪生述：〈海底旅行〉，《新小说》1904年第10期，61-62。

19) 红溪生述：〈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61。

20) 范苓：〈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121。

21) 简千芮：《鲁迅翻译小说〈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研究》(台中：国立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110。

也就是说,在中国以日本为中介译介大量小说之前,日译本因受到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呈现出章回体形式,在这些日译本和以日译本为底本所翻译的中文小说中,潜藏着中日小说双向交流的历史。不过,清末民初,更多是中国从较早进行维新的日本引入作品。以凡尔纳小说为例,早在日本明治十一年(1878)起,就有大量作品被翻译成日语,之后十年,在日本文坛出现凡尔纳小说译介热潮;<sup>22)</sup>在中国,晚清时期亦形成了凡尔纳小说译介热潮,在简千芮统计的《晚清儒勒·凡尔纳小说的中文译本一览表》中,<sup>23)</sup>半数以上的凡尔纳小说都以日译本为底本,而根据张云舒统计,仅在1901-1911年,就有121部中文小说由日本引介而来。<sup>24)</sup>

### (三)“旅行模式”

《海底旅行》原名为《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直译为“海底两万里”,194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及其以后的译本均采用此名。尽管,《海底旅行》的译法极可能是直接取自大平三次《五大洲中海底旅行》,但正是“旅行”构成了叙述的限制,使得小说呈现出某种“旅行模式”。简千芮对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旅行”问题亦有发现,并且提出“科幻旅行小说”的概念,不过其注意力集中于“旅行”对小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其“将‘科幻’与‘旅行’结合,目的便在于二者同时具有时间与空间的流失与移动的动态感”,<sup>25)</sup>该说可归纳至王德威乌托邦/异托邦理论之中。本文对“旅行模式”的探讨,主要为以旅行结构故事对叙述视角的限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巧妙转换。

22)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一卷(1897-1916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4。

23) 简千芮:《鲁迅翻译小说《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研究》,194-196。

24) 张云舒:《晚清时期日本小说汉译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51。

25) 简千芮:《鲁迅翻译小说《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研究》,30。

从《海底两万里》到《海底旅行》，除去采用“海底”这一提示小说独特空间的名词外，又以“旅行”代替标示深度的数量名词“两万里”，其间变化，可以从西方小说传统和晚清小说的整体环境中去解释。在西方文学中，流浪汉小说、探险小说等类型文学皆为以“旅行”串联主人公事迹，使其成为重要的文本的结构方式。而中国小说在晚清亦出现人物浪游的新变，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指出，人物流动得特别厉害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特征，或游历大半个中国，或从国内写到国外，《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剑腥录》等小说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就在于借用“记游”的方法，不知不觉限制了叙事者的视野。<sup>26)</sup>“旅行”对“两万里”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文本侧重点的转移，原著强调探测深度，是一种科学性的表达，译著暗示旅行奇闻异见，强调的是小说娱情功能；另一方面决定了译书的叙述视角是从旅行者出发的。

《海底旅行》的故事结构较为简单，从海上有妖怪与民为害说起，法国博物院院长欧露世与仆人高昔鲁及勇士李兰操出海帮忙捉拿妖怪，未曾想到海上浮礁(即内支士舰)，为船长李梦所救，后从太平洋穿越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周游红海、地中海，至好望角结束(未译完)。小说以“移步换景”方式穿插科学知识、海岛打猎、采珍珠等人物活动与海底风光，此为“旅行模式”之第一要义。不难发现的是，在《海底旅行》中，风光描绘带有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色彩，译述者善用四六小句进行描绘，如第九回，四人第一次潜水入海，对海底风光的描绘颇为精妙：“只见岩石峥嵘，蜿蜒相属，牵系水荇，摇曳波间，古木蔚森，杂花生树，时有红鱼，作队游泳自娱。正如暮春三月风飘，片片桃花节序，三秋霜染，山山枫叶，悦目快心，不可言状。”<sup>27)</sup>查看曾觉之的译本，并无如此风光，反而更多海

2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8。

洋生物介绍，可见，此段不仅对原著有删节，同时有译述者增补，将传统游记文体融入了小说之中。

同时，《海底旅行》的“旅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译者的视野，小说以欧露世为第一视角展开译述，如第五回，欧露世等三人第一次与内支士舰中的人相遇，并非宝黛相见式的相互打量，而仅以欧露世之眼描述了内支士舰内人的形貌：“一个生的身材高大，骨气轩昂，双目炯炯，寒光射人，披着头发，下垂肩际。一个生得额如圆珠，鼻若悬胆，风姿英迈，气魄沉雄，令人有凛凛不可犯之色。”<sup>28)</sup>又比如，当李梦带欧露世参观舰艇内部的时候，每个房间的描绘都通过欧露世之眼来观察，第一个房间是书房，作了如下描写：“只见满屋堆着图书不知有几多十万种，书架是用一色乌木，镂玉镶金，玲珑剔透，正中摆着一张独脚桌子，铺着葱绿催花鸢毛桌毡，两旁整整齐齐的拍着一行丹木椅子，桌上无数种新闻纸，各种业报之类，四壁电灯灼灼，映着些珍珠宝石，就像是水晶宫一样。”<sup>29)</sup>在小说中，虽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但是明显与彻头彻尾的全知视角有所差别，正是因为受限于“旅行模式”，小说的叙述才产生了一定的限制性，不知不觉之中，跟随了旅行者(欧露世)的目光。

另一种显示出叙述限制性的例子在第十四回，舰艇在海上遇到风浪，李梦对欧露世说，“今日要你等践初来之约，你可急去同高昔鲁李兰操两人共入一室，听我指挥，不许乱走一步。”<sup>30)</sup>三人同意听从李梦之令，却不知李梦在他们的饭中下药，第二日醒来时已在各自房间。此间，欧露世等对李梦下药之举有不解，但是译述者并未有所解释，同时亦未驱使人物向李梦寻求答案，于是这个疑问成为译述者因采用欧露世视角留下

27) 红溪生述：《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3期，72。

28)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81。

29)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99-100。

30)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3年第6期，58。

的谜团。类似的限制性复现于第二十回，因思乡心切，李兰操劝说欧露世趁舰艇离欧洲较近预备脱舰，他们商量于第二天晚上九点放小艇离开，但是，李梦恰巧在他们的约定时间来找欧露世谈历史，遂三人脱舰之计失败。三人对此事感到疑惑，但是亦不能做出解释，困惑于是否因李梦得知他们的脱舰计划而故意阻扰。

叙述中使用“旅行模式”可以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这一点大概是中日译介凡尔纳小说之时的共同发现，除去将《海底两万里》转化为《海底旅行》，又如《从地球到月球》，井上勤的日译本翻译为《(九十七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鲁迅译为《月界旅行》；《气球上的五星期》，井上勤的日译本翻译为《亚弗利加内地三十五日间空中旅行》，而《江苏》刊载的译本直接翻译为《空中旅行记》。客观上说，这一译法在吸引读者阅读的同时也带来了小说体裁本身的变革，虽然这种尝试并非是一种自觉，但是亦为晚清小说在接受西方小说冲击之后产生的变革做了注脚。更值得提出的是，此时的变革是缓慢的，所以我们在《海底旅行》中看到更多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学转化而来的小说写法，正如陈平原所观察到的一样，晚清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与赋体问答有关，而旅行中的风光描绘与传统的游记文学有关。<sup>31)</sup>

### 三、科学与小说的变奏

要全面认识《海底旅行》的译介，不能忽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的解答。<sup>32)</sup>在“浅而

3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85-192。

3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1。

易解”“乐而多趣”之外，文章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不仅能满足凡人对“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的需求，而且能使人“心有戚戚”于“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人之恒情”。<sup>33)</sup>也就是说，在这篇论说中，对小说功能的理解不仅超出了常人认识的消闲范畴，也超出了文章本身有意突出的“群治”功能，所谓的“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和“人之恒情”，正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也就呼应了这部分末尾所言：“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sup>34)</sup>这不仅是在借小说改良群治的策略意义上提高小说的地位，更是在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等级中去提高小说的地位，正是在这一认识主导之下，下文提出了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支配人的力量。不过，正如文章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题，尽管作者对小说的阐释包含了以文学为本位的部分，在实际操作中，基于国家危机的现实处境和文学规律的限制，译作和创作都更突出地反映了文学的政治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本位的彻底退却，相反，恰如《海底旅行》所呈现的，文学本位和政治功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错。

首先，作为“科学小说”栏目刊载过的唯一作品，《海底旅行》显然是被精心挑选的，在凡尔纳小说的日译热潮中，为何是《海底旅行》被选中就成为了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文本本身来说，出于译作能引起读者兴趣方面的考虑，“海底”这一异于寻常世界的空间，正好符合“世界外之世界”的认识，也就可以“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sup>35)</sup>就译介作品的历史背景来说，以清政府战败、北洋水师全

---

3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2。

34)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3。

3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

军覆没告终的甲午海战显然给了国人惨痛的历史教训，葛兆光认为这一场战争带给士大夫“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sup>36)</sup>所以《海底旅行》中丰富的船舰想象，也可视为文本选择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反映在译文中，比如第八回，介绍机器房内有甲乙两类机械维持潜艇运行，甲类主生电，乙类通过甲类所生之电直接控制内支士舰各部门运转，紧接着，作者以李梦之口对潜艇形貌和浮沉原理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本船乃一长圆形，两头尖屑似针，恰似吕宋烟的形状。船身長二百三十二尺，平均六十六尺，容积一千五百立方码(二尺四寸)……至于浮沉一事，其窍妙全在那许多的大水桶。这水桶一满一干，那船便一起一落。若要沉深沉浅，只估量着水量的轻重，运转没有不如意的。”<sup>37)</sup>这段介绍之精细，在《海底旅行》中是非常罕见的，不仅涉及了内支士舰的沉浮原理，并且以精确数字来对内支士舰的尺寸、容积、重量进行介绍，而括号中的“二尺四寸”，更是译书中对于立方码的注释，以便于读者对其规模宏制有所想象。1918年，《小说月报》第9卷第8号刊载梅梦的“科学小说”《水底潜行艇》，该小说不仅对潜艇有不同分类，更是将其视为国防的重要装备，持有与《海底旅行》一样的军备观念。

其次，从批注来看，亦显示出《海底旅行》中对科学救亡和小说笔法的双重考虑。《海底旅行》中的科学内容显然是译者和批注者都极为关注的内容，批注者对意译策略带来的问题亦有所注意，不仅对翻译中不周之处有辩解，如“此著原是科学小说，一切根据格致学理，但非门外汉所能尽道耳”；<sup>38)</sup>而且总结章回内容，帮助读者理解，如“电学功

3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31。

37) 红溪生述：〈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3期，70。

38)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106。



用，今姑萌芽，将来正不知发达到怎么地步，此回全是著者自己发表电学上的意见。”<sup>39)</sup>于此同时，小说的笔法同样也是批注者极为关注的，如对于点出船长姓名的改动，有批注“原文是第五回便点出船长姓名，译述者移至此处(第六回)，便觉文情突兀了许多。”<sup>40)</sup>第十九回中，则称赞对于欧露世内心想法的书写“笔墨拉杂曲折，全是模仿红楼梦的。”<sup>41)</sup>这也就为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补充了一条理由：一旦如披发生(即罗普)这样的士大夫在小说读者中占有重要份额之后，即使在政治功利的目的之下，他们对小说依然有文学品质上的要求，也就渐渐地将其文学趣味投射到小说中来，促成小说文学性的提升。<sup>42)</sup>

第三，从小说的内容上来看，科学内容出于完全的政治功利，而救亡呼号则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是一种“人之恒情”，是士大夫以诗文心忧国家的文学传统在小说中的转化。《海底旅行》虽然没有提出“科学救国”这样的口号，<sup>43)</sup>但是表达此种观点的情节和言论缕缕出现，如欧露世想留在内支士号学习技术的时候，一贯少言寡语的高昔鲁说，“那怕做的再十倍精美于此，试问何补于人，正是一件不关痛痒的东西”，<sup>44)</sup>而李梦船

39)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107。

40)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年第2期，96。

41)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5年第1期，88。

42) 袁进认为，梁启超之所以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是因为他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界革命纳入了“新民”即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中，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同时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满足了小说家提高小说文学地位的需求，赢得多数小说家的支持；最后，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使得士大夫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读者，扩大了读者群。见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卷第3期，24-29。

43) 不少研究都认为是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使得“科学救国”逐步发展为一种思潮。参见薛子燕，《科学与救国：近代中国科学观念开展的历史语境》，《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31卷第2期，66-72。蒋道平、徐飞，《“科学救国”的先驱探索及当代启示——任鸿隽现代科学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与现实价值》，《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32卷第10期，1441-1446。

44)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3年第5期，107。

长虽然被塑造为一个避世者形象，却也自陈“我费了这样大的力量，掏了这样大的神气，实在也不过是想救济世人。”<sup>45)</sup> 呼应了刊发在《新民丛报》上的广告：“此书为法国大科学家之作，结构奇伟，寄托遥深，盖稀世之名著也，其中叙述海底，别有世界，华严帝纲，光怪陆离，令人目骇夺魂，不可思议，而所尤重者，在发挥自由精神，不徒以科学著而已，其用笔之神妙，兔起鹘落，每读一回，掩卷百思，不能知其下回作何变相，洵中国前所未有之奇书也，第一号拟登四回豫告其目”。<sup>46)</sup> 所谓“寄托遥深”，“不徒以科学著”是既着眼于政治功利，也心忧国家之情的表达。

极为相似的是，鲁迅译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亦显示政治功用和小说文学性的交错。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东京时，除去注意林琴南与苏曼殊等人翻译的作品，“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sup>47)</sup> 这一段回忆不仅说明了鲁迅确实是在《新小说》，或者更准确说是“科学小说”的影响之下翻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亦说明了鲁迅早期译介同样着眼于小说的政治功用。鲁迅本人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的论述似乎也能着眼于政治功利的小说观提供佐证，他不仅认为“盖胪陈科学，常使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更

45) 红溪生述，披发生批：〈海底旅行〉，《新小说》1903年第5期，64。

46) 转引自袁进关于科学思潮和与科幻小说的论述，详见袁进：《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2-116。

47)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1925年第30期，303。

进一步指出“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sup>48)</sup>

有趣的是，译者本人的说法似乎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脱节，孙尧天认为“普及‘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翻译科学小说的首要目的，但对于‘人情’的强调却更能显示出鲁迅本人的主观意图对文本的介入”，<sup>49)</sup>他以“英雄史诗”论述译作中的尚武精神，并认为此种表现与鲁迅在留日后期推崇反抗主义的“摩罗”诗人相接。也就是说，在科学与小说之间，虽然鲁迅在《辨言》中强调的是前者，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却偏向了人之问题的处理，是以人生为文学中心的不自觉表现。这一分析也就使得鲁迅早期译作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相连，正如周作人所言，“五四”后的鲁迅“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与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sup>50)</sup>

如果说，“科学小说”是为了借小说传播“科学”，那么，这一办法本身即包含着一种文学的功利目的，它必须同时处理科学和小说两种不同事物，而以“科学”为小说的一种新题材更是注定了这一融合两者的活动最终要以文学为中心，如同《海底旅行》中救国救民的呼喊和鲁迅译作中的“人情”表现，归根结底都是译者在处理他所认识到的小说本身的问题。不能忽略的是，尽管类似《海底旅行》这样的作品相对浅显和

48)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 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4。

49) 孙尧天：〈“科学”与“人情”的纠葛——论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56。

50)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303。

生硬,但是“科学小说”这一分类却被接受下来,在《新小说》之后,这种说法多次出现,《戊申全年画报》《少年》《观象丛报》《科学画报》《科学世界》等清末民初的报刊都有以“科学小说”为分类的小说,《小说月报》还曾征集以“科学”为主题小说,其言“发明精奥而文情并茂者”也包含了对于“科学”和“小说”双重特性的要求。<sup>51)</sup>“五四”主将中,除去鲁迅译介过“科学小说”以外,还有雁冰(即茅盾)、泽民1920年连载于《学生》杂志的《理工学生在校记》亦被称为“科学小说”。自清末“科学小说”的兴起,至“五四”以“科学”为口号,两者显然有一定关联,任冬梅的文章《从清末“科学小说”的流布看“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指认了这一点,同时提出局限在于“‘科学小说’的流行的确让很多清末国人对‘科学’产生了某种‘误读’,大多数读者都将‘科学’理解为神奇炫目的科技功能,却完全无法体会‘科学’背后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sup>52)</sup>

#### 四、结语

作为《新小说》杂志“科学小说”栏目唯一刊载过的文学作品,《海底旅行》的译介不仅有着严峻的现实语境,也是晚清小说变革中的产物。首先,在文学观念上,以小说改良群治虽为一种功利的文学观,但是却为小说注入了严肃精神,提高了小说在文学等级中的位置。《海底旅行》的译介,正是把事关家国危亡、民族存亡的政治功利性注入了小说中,

51) 〈本社现欲征求下列各种短篇小说〉,《小说月报》1918年第9卷第8期, 2。

52) 任冬梅:〈从清末“科学小说”的流布看“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1期, 1-10。

也使得凡尔纳小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注重“政治性”阅读。<sup>53)</sup>其次,在文体上,《海底旅行》虽然沿用了章回体形式,但是意译策略却使其不自觉地吸收了《海底两万里》第一人称叙事的特点,打破了传统的全知视角,结果是叙述受到一定限制,增加了小说疑点,在故事层面更为吸引人。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变革来看,这种吸收是十分有限的,并未能真正改造章回体小说,也就与现代小说相去甚远,是晚清小说的普遍特征。第三,早期“科学小说”的译介实践,引起了对政治功利性的小说观和科学精神的反思。如鲁迅,较早转向非直接功利性的文学创作;而梁启超对“科学”的反思认为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以为科学只在物理、化学等专门学科;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如为战争提供器具,又为贫富分化提供器械。又提出“有系统之知识,叫做科学,可以叫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sup>54)</sup>该说发表于1922年,距离《海底旅行》初刊已经过了20年,或许可以看作对《新小说》中“科学小说”的一个遥远回应,也从侧面证明了清末民初“科学”一词由简单的器物观到社会思潮的转变。最后,从类型文学的角度来看,引介之初的救亡语境以及文体上独特的过渡性色彩都是“科学小说”之特殊所在,这也就提示以“晚清”这一前置定语限定“早期中国‘科幻’的特异性方面”并不比“科学小说”更直接有力,<sup>55)</sup>进一步说,将“science fiction”笼统地翻译为“科幻小说”还需再做考量。

---

53)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

54)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1922年第9期,860-862。

55) 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8期,73。

## ▣ 参考文献

- 凡尔纳著、曾觉之译：《海底两万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 鲁迅：《鲁迅全集 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一卷(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袁进：《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邱若宏：《传播与启蒙 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张云舒：《晚清时期日本小说汉译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 简千芮：《鲁迅翻译小说〈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研究》，国立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期，1902年。
- 卢籍东、红溪生译：〈海底旅行〉，《新小说》第1-18期，1902-1905年。
- 〈本社现欲征求下列各种短篇小说〉，《小说月报》第9卷第8期，1918年。
-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9期，1922年。
-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30期，1925年。
- 黄祿善：〈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上海科技翻译》第4期，2003年。
- 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3期，2004年。
- 范苓：〈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9年。
- 任冬梅：〈从清末“科学小说”的流布看“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科技史杂志》第1期，2012年。
- 蒋道平、徐飞，〈“科学救国”的先驱探索及当代启示——任鸿隽现代科学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与现实价值〉，《科学学研究》第32卷第10期，2014年。

- 薛子燕：〈科学与救国：近代中国科学观念开展的历史语境〉，《自然辩证法研究》第31卷第2期，2015年。
- 袁丽梅：〈消闲读物，启蒙利器——近代西方科学小说译介研究〉，《当代外语研究》第11期，2015年。
- 陈向红：〈凡尔纳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7年。
- 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2017年。
- 孙尧天：〈“科学”与“人情”的纠葛——论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文艺研究》第5期，2017年。
- 陈翔灵：〈清末科技新词的汉译探析——以翻译小说《海底旅行》为例〉，《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2018年。

〈Abstract〉

##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Science Fiction

— Take “Undersea Travel” as an Example

Yan, Dongfang

“Undersea Travel”, translated from Jules Verne's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by Lu Jidong and Hong Xisheng, has been serialized in “New Fi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it by means of text perusal.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the translation background of “Undersea Travel” in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New Fiction”.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free translation style”, on text addition and deletion, the use of “chapter-based style” in translation, and the change of narrative mode brought by the “travel” structure text. The third part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tandard in the fi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text selection, the annotation and the contents. The fourth part summarizes the meaning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yle and the genre of “Undersea Travel”.

Key Words : “Undersea Travel”, “science fiction”, “New Fiction”,  
Liang Qichao, Jules Veme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